2009 年 5 月　　清史研究　　May 2009
第 2 期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No. 2

学术动态

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
——纪念戊戌变法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　毅

在戊戌维新 110 周年之际，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2008 年 10 月 11 —1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以“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的三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提交论文近 30 篇。历史、政治、新闻学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戊戌维新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和诠释，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戊戌维新的历史内涵。

一、如何正确看待戊戌维新

任何变革都是一场系统的工程，会引发社会各个领域的变迁，戊戌维新也不例外。如何正确看待戊戌维新的成败得失，是本次会议主题带给我们的思考。

李文海从两个方面解读了戊戌维新的作用：从对晚清社会变革的作用来看，戊戌维新既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还为后来的经济变革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并带来了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没有戊戌维新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建立共和，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党所领导的革命，也就无从谈起新中国的建立。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走向进步实现独立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俞祖华、赵慧峰则分析了戊戌维新的现代性价值，指出戊戌变法正式开启了从专制、人治迈向民主、法治的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历程，戊戌思潮孕育了以移植现代性价值理念、建立现代文艺学术为重点内容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现代性的早期探索。

部分学者细化了对戊戌维新得失的检视。何晓明从三个层面分析了维新的成败：首先，戊戌维新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其次，从谋略选择上说，康有为力主的自上而下直接进入实际政治核心的变法谋略是无效的；但戊戌后，变法的许多条款陆续恢复实施，清末新政践履的就是戊戌所要达到的部分目的。第三，戊戌时期学会的兴起、绅权的争取等，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现实政治层面的维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康有为“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却因得不到时人的理解而只能“秘不示人”，更别提其建构和实现了。余音从维新目标的视角对戊戌维新的得失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戊戌维新的目标可分为初级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维新未完成“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的高级目标，但是却完成了其初级目标 ——创建京师大学堂。他进一步指出，既然初级目标已经实现，那么将维新界定为失败的做法值得商榷，

[收稿日期] 2008 - 11 - 30
[作者简介] 王毅 (1982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北京 100102

以“夭折说”取代“失败说”，才更为客观、准确，因为夭折比一般意义上的失败程度上要轻许多。余音的建议值得注意，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时，我们要避免笼统下结论的做法，应多角度多层次地审视他们，才能获得更加准确的认知。

戊戌维新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时，还通常被认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改良道路在近代中国走不通。罗福惠、何卓恩对此提出了疑义，认为改良有两种定义方式，试图通过渐进演变从而推翻现有架构、另建新架构的戊戌变法失败是无疑的，但以张之洞、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不改变传统体制基本结构的局部改良思潮却获得了成功，所以不能说改良路线行不通。李文海作出了回应。他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一历史教训还是成立的。同康梁提倡的改良主义线路一样，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也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二、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

维新运动最终走向了失败，这引发了人们对失败原因的追究。就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而言，学者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一，维新派选择了错误的改革“庇护”。迟云飞、王立群认为维新派将变法希望寄托在实力弱小的光绪帝上，与力量强大的后党发生了权力冲突，从而导致了维新的失败。余音将此帝弱后强的局面称为“大太后、小皇帝”的错位。第二，维新派变法策略的失误。迟云飞、王立群指出维新派低估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妄图短期内实现全变大变，急变大变的变法路径侵犯了许多人的利益，使得变法遭遇了巨大的反作用力而归于夭折了。第三，领导人康有为政治能力的局限。郭双林、余音都认为康有为政治经验不足、领导能力的有限应该为维新失败负一定责任。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则通过解读当时的一个日本书记官——中岛雄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记述，分析了变法目击者对变法失败原因的看法。中岛雄认为康有为是“名士，但处世经验明显不足”，康采取过激的改革方案，严重脱离群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通过历史见证者来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做法具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历史的见证者具有在场的优势，身临其中使他们有可能对此做出更为客观、全面的评判。但是，这种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历史的见证者的观察可能因自己的立场又会产生偏差。所以，如何把握和评判历史的见证者对历史的论述，这是史学工作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与会的部分学者则更加重视失败的客观原因。邹小站认为当时社会条件不成熟则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当时的教育未变化，所以变法的思想、人才储备不足；社会经济也不能造成变革的力量。史革新指出当时情形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且复杂，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守旧反对势力太大。黄兴涛则强调，康有为对官制改革在维新变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很充分的，这从《日本变政考》等中的有关内容可见一斑。这在他看来也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而关键的经验。因此，当时中国官制改革失败的事实，虽有方法的问题，但更应当注重当时清廷变法客观基础整体薄弱的现实。他和史革新都指出不要因康有为政治经验的不足而否定其政治才识，要警惕放大康有为失误的做法，要尽量对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是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致力于探寻原因之后的原因是本次会议的特色之一。李文海认为慈禧之所以发动政变，是因为戊戌维新的终极目标是试图超越皇权，这也能说明为什么慈禧对清末新政表现出不同于戊戌的态度，因为后者的目的在于维护皇权。郑匡民、邱涛认为戊戌政变的发生与维新派、帝党与日本结盟的活动密切相关。他们认为甲午战争后形成的东亚国家环境刺激了日本与中国结盟理论与实践的形成，日方在戊戌时期逐渐向戊戌维新派与帝党靠近，这一政策刺激了慈禧集团，出于对自己权位的考虑，慈禧发动了政变。

三、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思想

从思想层面关注戊戌维新，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俞祖华、赵慧峰指出，戊戌思潮构成了近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大主义的共同源头。首先，正是基于严复与梁启超对自由主义的宣传和介绍及实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现代性的自由主义才得以生成。其次，他们认为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儒家，因为康有为依据儒学对现代性做出了新诠释及新批判，这种从传统角度来检视现代性的思维正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第三，激进主义生成于戊戌时期：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宣传和解读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西方社会主义有相似性，社会主义是激进主义的重要流派；“大变”、“全变”等激进的主张是现代化变革乃至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的起点。二位学者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热烈的讨论。

何晓明认为判断一种思潮始于何时，应追究当时是否由某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提出了意旨鲜明的立题。依据这一标准，何教授认为，自由主义肇始于戊戌时期的命题可以成立，因为当时颇具影响的严复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理念；但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可以追溯到洋务时期，早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冯桂芬就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之富强之术”的主张，这是后来文化保守主义所遵循的一个重要思路。郑大华认同自由主义始于严复的看法，但不同意上述学者对文化保守主义开端的界定，因为保守是相对激进而言的，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冯桂芬的主张不仅不保守，相反是一种相对激进的思想。只是到了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进步了，这时的“中体西用”才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纲领。依据自己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郑教授也不赞成把戊戌维新思潮视之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起源，他认为与戊戌维新思想比较，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更具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他更不同意将康有为视作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因为康有为改造儒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革社会，而现代新儒家改造儒学的目的是为了使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而日趋僵化的儒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对于把社会主义称之为激进主义，郑教授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个复杂的概念，它本身包括不同的形态，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就不能算作激进思潮。他指出激进主义应包括主张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显然戊戌时期不是激进主义的生成时段。对于郑教授关于保守与激进相对性的论述，李喜所表示赞同，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五四以后作为全盘西化思潮的回应而出现的。关于近代中国史上各种主义思潮的研究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个争议颇多的难题。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厘清了一些传统认识的误区，但认识的分歧也彰显了该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邹小站和王天根对戊戌思潮作了动态的考察。邹小站以西学东渐思潮为基点，梳理了戊戌时期国人的西学输入工作，分析了西学输入所引发的民间风气的变化。邹小站将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纳入研究视野的做法具有较大的学理价值。李文海教授在会上就呼吁要加强对戊戌维新运动对社会生活变革作用的研究，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怎样和在多大程度上使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生活乃至思想观念上发生了变革是一个有意思且有意义的研究领域。王天根从戊戌时期重要报刊舆论的变迁入手，考察了维新派建构和传播维新思想理论的动态过程，梳理了南北维新报刊掌握话语权到逐渐式微的过程。王天根将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精神。

无疑，思想是复杂的，具有多个面相。选取不同侧面的思想为研究对象，对维新思想作横向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被与会学者采用，并与对维新思想纵角度的考察构成了互补。关于戊戌维新的学术思想，罗检秋认为仁学是当时维新思想的主色，论述了康有为、谭嗣同在传承儒学的基础上，因应时势、以西学为参照对儒学的重释，并分析了其中的思想意义，还关注了他们仁学思想的缺陷以及仁学理念与他们人生遭遇的关系。杨艳萍则以京师大学堂为切入点，考察了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和章程及

清末民初的课程设置与规划等，结合京师大学堂“商科”大学开办后的具体教学实践，简要地梳理了我国早期“商科”高等教育兴办的历程和概况，反映了戊戌前后的思想家关于教育的理念和“商战”的经济主张。彭平一分析了维新人士和官僚在地方上的政治改革实践，指出其核心是试图实现政治权力的下移，从中投射出维新派的地方政治思想及其对戊戌政治改革的影响。

四、戊戌人物研究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研究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会上个案研讨的重点。对康有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分析康有为及其思想在戊戌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对其思想理论的学理性研究。江中孝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能否作为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提出了质疑，因为资料显示，戊戌期间光绪帝要求官员签注《校邠庐抗议》并颁发了《劝学篇》，前者目的在于制造变法舆论氛围并了解官员思想状况，后者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而康的“两考”除了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外，对光绪帝与大臣的影响有限。江中孝还进一步指出，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值得讨论，因为戊戌维新是按照两条路径推行的，即中央的变革和地方的维新，康与地方的维新没有联系，即便在中央，康由于其资历、品性、学术等方面的有限才能也难算为完全的领导者。

房德邻不赞同江中孝对康有为领导地位的质疑，认为冯桂芬、张之洞的理论不能算作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否则戊戌变法只能算作洋务运动发展的新阶段，而二者是有本质区别；另外，光绪极其信任康，所以康的思想言论对光绪帝是可以发生较大影响的。和房德邻相反，郑海麟则支持江中孝的观点。他依据陈寅恪的戊戌变法二源说及傅斯年的相关论述，认为只从京师维新角度检视戊戌维新并简单地将康、梁视为维新变法的领袖而忽略湖南维新的重要地位及黄遵宪、陈宝箴等地方官僚对湖南维新的作用有失偏颇。郑大华肯定了郑海麟对戊戌变法二源说的运用，提出要注意湖南新政与京师变革之间的区别，就此而言，他认为戊戌维新的领袖应是一个群体而非某一个人。

在关于康有为思想的讨论方面，龚郭清从价值观及理论源泉层面上分析了康有为的改革思想，对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诉求进行了剖析，认为康的改革思想兼顾到了时代性的特殊追寻与人性圆满的普适性关照，两种价值理念在当时是统一的，并对后来的改革者有着深刻的启迪。李帆将研究的时限下延到戊戌维新后，考察了刘师培对康有为“两考”的驳难，分析了其深层的文化原因和政治原因。黄兴涛考察了戊戌时期康有为对日本汉字新名词的翻译和运用，充分肯定了其思想上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又指出，辛亥革命后曾经致力于对日本新名词的翻译和运用的康有为却对学术思想界滥译和运用日本新名词提出了尖锐批评，其中原因值得研究。

作为变法的缔造者之一的梁启超也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张昭军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指出其“新史学”是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从而表现了中国学术史建构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杨齐福和郭双林都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学的角度展开对梁启超的研究。杨齐福阐述了梁启超与恽毓鼎的学术交往和社会交往，以此反映了梁启超对清末民初过渡时代士人思想和学术的影响，体现了历史转型时期传统士人政治思想保守、文化生活趋新的矛盾。郭双林注意到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人们常将梁启超与章士钊相提并论的现象，解析了二人之间的人事往来和章对梁舆论上的批评和肯定，由此推论出前期“甲寅”派真正的言说对象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而非袁世凯为首的帝制派，使我们对“甲寅”派有了新的认识。

对严复思想及行为的研究同样是此次会议的重点。马克锋从中西学的两个层面分析了严复“三民”思想的理论渊源，从当代国民性塑造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严复的“三民”思想的深刻内涵。杨琥依据北大图书馆藏夏曾佑日记及其他相关资料，考察了夏曾佑与严复之间的往来及二人与其他人一起创办《国闻报》的时空

环境与人脉关系，阐述了夏严二人在《国闻报》上论说，最后分析了《国闻报》面临的内外矛盾及其应对，尤其论述了王文韶及日方势力对《国闻报》的扶持。作为清朝高官的李端棻，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积极支持康、梁变法，而以往对他的研究却不多。史革新注意到了李端棻在晚清教育改革中所作的努力与贡献，他以李端棻的一道奏折为研究对象，系统地阐释了李关于教育改革的设想和方案，并从文化、政治两个维度分析了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意义，肯定了李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

与会学者还开展了对黄遵宪、陈宝箴等主导地方新政人物的研究。作为《黄遵宪全集》编者的陈铮，从晚清思想文化的角度立论，在四个层面上概括了黄遵宪的维新思想，并剖析了其维新思想在当时语境下的意义及其历史影响。郑海麟将黄遵宪和陈宝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二人的交谊及二人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对湖南维新的共同努力和贡献。小野泰教以新近编撰的《陈宝箴集》为主要史料，对陈宝箴的政治行为及其真正动机进行了解析。他指出陈宝箴到湖南任职的任务是按照清廷改革财政和增加军备的方案推行改革，开办时务学堂是为了振兴产业、培养人才，南学会则是为了使乡绅接受官方建议，减少清廷改革的阻力，二者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经费财政不足及乡绅的反对。

五、戊戌维新研究展望

会议中，学者们还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戊戌维新研究及如何构建良好学术风气的建议。

（一）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学术方法和视角的创新能有力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会议中一些学者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新的研究视野中重新解读戊戌维新，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肯定。郑大华就充分肯定了从人际关系视角去认识戊戌人物的方法论意义，认为这种研究范式是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一种扩展，使研究者摆脱经济环境研究的独一模式的束缚，对人物生成状况与环境，如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审视，能更有力地说明缘何同一时代相似经济环境下成长的人物会呈现出不同的性格与品质，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人物，所以他呼吁以后要加强这个方面的研究。深化跨学科的交流，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公共关系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检视戊戌维新是今后此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戊戌维新引发了诸多社会领域的变革，对当时的思想、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但是，目前对戊戌维新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和政治影响方面。有鉴于此，李文海提出今后的研究要加强对戊戌维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作用的考察，从而扩展戊戌维新研究的广度。今后戊戌维新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是：不仅要加强旧有问题的研究，使旧有问题的研究更加细化、具体、深入的同时，还要挖掘新的课题，关照戊戌维新对当时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影响和作用，并注重对维新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自由、和谐学术气氛的推广。此次会议特色之一就是营造了一种自由、宽容和和谐的学术氛围。各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砥砺学术，各种观点的交锋纠正了认识的偏颇，不同思想的碰撞产生了新的认知与理解。李文海主张将这种会议精神推广到公开发表的刊物上，认为刊物可以同时登载观点相异或相反的文章，这样能拓展人们的认识，推动学术的发展。李教授的提议为今后学术界的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学术正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交流下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研究只有在获取多面相的真实后才能寻得意义，学术界应该致力于构建一个宽容、自由的平台，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